

挑運難為生 疫境雪上霜 40萬減至2000人

山城棒棒漸消逝

卸下竹棒紛轉行



「棒棒軍」如今僅剩不到2,000人。資料圖片



做了25年「棒棒」，鄧禮俊轉行做貨車司機。受訪者供圖



吳鴻斌將「棒棒」時期學到的打包和搬貨技巧運用到新工作中。受訪者供圖



冉光輝註冊成外賣員，淡季時就轉行送外賣。受訪者供圖

解放碑到朝天門 棒棒軍凝重慶魂

新聞鏈接

改革開放後，二十多萬農民湧進重慶城。在山城的大街小巷，到處都可以看到一些民工，手裏一根竹棒、兩條繩子扛挑着重物幹活賺錢。因為挑着一根竹棒幹活，人們稱他們為「棒棒」，即重慶的挑夫。

解放碑是重慶最繁華的地區，朝天門碼頭又是重慶最重要的貨物集散地，因此從解放碑到朝天門碼頭地段曾是重慶貨流量最大的地區，也成為「棒棒軍」一度活躍的地區。熙熙攘攘中，「棒棒」背扛肩挑，爬坡上坎，給這座城市帶來了生氣和喧囂。

紀錄片拍出苦難與希望

因為這個群體的獨特性，「棒棒軍」一直是影視藝術追蹤的焦點。1997年，重慶直轄同年，一部以「棒棒」真實生活為背景的方言電視劇《山城棒棒軍》上映，這部劇當時紅遍了大江南北，在豆瓣上有9.4高分。

2016年，紀錄片《最後的棒棒》上映，導演何苦為了拍攝，自己當了一年「棒棒」，紀錄片拍出了苦難和希望，被網友譽為「現實版的《活着》」，豆瓣評分高達9.6分。

2015年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重慶萬州港碼頭對「棒棒」們說：「你們很了不起！每一分錢都是流汗掙來的，是中國人民勤勞的象徵。」


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朝天門碼頭的「棒棒軍」人數眾多。網上圖片

「棒棒軍」曾形成了山城重慶極具特色的一道風景。這群大街小巷遍地可見的人力挑夫，以竹棒、繩索為工具，幫人搬運貨物謀生。當地人無論是去超市購物，還是搬家、裝修，只要準備幾塊錢零錢，用重慶方言在路邊高喊「棒棒」，就會有人應聲而至，幫不願負重的市民挑運回家。

然而，隨着城市物流行業的快速發展，「棒棒」們的生計受到巨大衝擊，行業走向式微。據2021年西北民族大學的調查，「棒棒」已從頂峰超過40萬人驟減至不足2,000人。為了謀生，許多「棒棒」們嘗試轉行。

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、張蕊 重慶報道

「現在是什麼年代了，哪還有多少『棒棒』？你們可以去朝天門碰碰運氣。」這是香港文匯報記者詢問一名老重慶市民得到的回答。

重慶自古航運發達，滿載貨物的船隻，在長江與嘉陵江交匯處的朝天門碼頭聚集。因碼頭在低處，城市在高處，過去的幾十年，「棒棒」成為連接碼頭和城市的毛細血管。

「棒棒一哥」冉光輝：日常送貨用不到我們了

在重慶朝天門小商品批發市場，冉光輝算得是個名人。十年前，他上衣別在腰間、肩扛着貨物，牽着3歲的兒子一步一步走下梯坎的樣子被記者拍下。做「棒棒」十年，他「扛出」一套市中心60平方米的二居室，也成為媒體爭相報道的「棒棒一哥」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大正批發商場見到了冉光輝，他正準備去扛運一單200多斤重的貨，從貨車上卸貨再背上四樓，這趟辛苦的搬運只能賺10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。

隨着疫情反覆，即使是「棒棒一哥」賺錢也愈來愈難。「過去重慶大街小巷都是『棒棒』，比如你去超市買了米，喊個『棒棒』五塊錢送上樓。現在年輕人都習慣了送貨上門，日常用不到

我們了。」

冉光輝說，現在「棒棒」的行情主要隨着批發市場的行市波動。服裝批發需要把成箱的貨物從商場運到貨車上，這也是「棒棒」收入的主要來源。然而，疫情打擊了服裝批發生意，冉光輝不得不考慮轉行。

上個月，他註冊成了一名外賣騎手，還拜了「95後」外賣小哥為師。他接的第一個單子是將兩箱礦泉水和幾包日用百貨，從朝天門送到白象居。1.1公里的距離，對他來說不是問題。從超市取了單，二十斤左右的商品，冉光輝將它們套在扁擔上，挑起來就走。不用看導航，十多分鐘後，他就將商品交到了收貨者的手中。這一單冉光輝賺了8元。

雖然外賣員比「棒棒」輕鬆，但冉光輝仍對「棒棒」這份職業有留戀之情。

「外賣這行確實是年輕人居多，我不習慣一邊看手機、一邊搶單，還要一邊送貨。所以只要批發市場還有生意，我還是回來做『棒棒』，年紀大了，改行沒這麼容易。」

不過，56歲的冉光輝稱，比自己年輕十歲左右的「棒棒」大多已經轉行了；以前僅朝天門片區的「棒棒」就有上萬人，現在只剩幾百人。

「00後」吳鴻斌：幹一天還不夠吃兩碗麵

對於一部分從業者來說，「棒棒」是他們通往下一個行業的跳板，積累下生存的本錢，就有了資本學一門手藝。出生於2000年的吳鴻斌在高中畢業後，就跟隨叔叔加入了朝天門「棒棒」的隊伍。

「『棒棒』這個職業，對我們窮人家的孩子來說，最大的優點是工資即時到賬，搬一次貨無論是五塊錢還是八塊錢，我都能馬上拿到酬勞，沒有月結、沒有欠薪。」

吳鴻斌說，自己也曾希望如冉光輝一樣，在重慶買房安家。懷着賺錢買房的希望入行不久，他卻發現，這一行的苦非比尋常——不僅扛貨需要技巧，而且在有限的客戶中尋找穩定的收入來源對於新人並不友好，有時一天賺的錢還不夠吃兩碗麵。

三年後，他轉行成了一名貨車司機。

吳鴻斌用攢下的錢，租了一輛麵包車（港稱客貨車）運貨，「棒棒」時期學到的打包技術和搬貨的技巧，都運用了新的工作中，那時候認識的僱主和同行也成為了他的人脈。

「從某種程度上說，我還是一個『棒棒』，只是手裏不拿着那根竹棒了。」吳鴻斌說。

「棒棒」被商場拒入 網友憤慨抱不平

雖然「棒棒」們從事的是基本的體力勞動，但他們也都有職業操守，遵守行規。只要是答應搬到的地方，僱主不需要派人跟隨，絕不會私吞；如果半天沒開張，生意好的就會分出一兩單給生意差的「棒棒」；他們有微信群，如果誰接了大單，會根據僱主需要的人數，先照顧急需錢的同行們……

然而，腳踏實地賺一份辛苦錢的「棒棒」們有時仍會受到歧視。

今年6月，在一間大型購物中心來福士廣場，當用竹竿挑着貨物的冉光輝走到門前時，保安以衣冠不整為原因將他拒之門外。他與保安理論，保安妥協說，可以讓進去，但肩膀上的竹棒要放下，由保安代為看管。他一時氣憤，在社交媒體公開質問「重慶的商場，憑什麼不讓棒棒進入？」

因為「網紅棒棒」的影響力，來福士所屬凱德集團在輿論壓力下回應道，「作為一個客流量較大的項目，為了實現高效管理人貨分流，是為了客人的安全和舒適考慮。」不過對「棒棒」深具情感的重慶當地人並不買賬，「『棒棒』是人，不是貨」的留言獲得大量點讚。



像許多「棒棒」一樣，冉光輝習慣了赤膊運貨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攝

半日辛勞 僅賺70元

特稿

入冬的重慶陰冷潮濕。為了背運上百斤的貨物，冉光輝將衣服脫掉，光着上身，大步流星地走下高高的樓梯。如此5趟貨物來回，冉光輝半天的收入是70元，百斤貨物運送單價不到15元。

冉光輝笑道，「都是老僱主，他們給多少我就拿多少，這樣才有人找你幹活。有些『棒棒』一會賺錢少，一會嫌貨重，一整天都找不到活幹。」

常年與冉光輝一同做工的劉師傅說，這十年來，「棒棒」接單價格一分錢未上漲，而餐費、交通費、孩子生活費卻逐年增多，「我剛做『棒棒』那會，扛一趟貨7塊錢，一碗小麵2塊錢；現在扛一趟貨還是七八塊，一碗小麵已經7塊錢了。」劉師傅稱當年自己的收入和出租車司機差別不大，現在卻不到出租車司機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。

「吃力不討好的事沒人做了」

貨車司機鄧禮俊也曾做過25年的「棒棒」。

1990年，22歲的鄧禮俊和妻子從老家忠縣來到朝天門碼頭做起了「棒棒」，他學會了幾句號子（體力勞動中協同使勁時，為統一步調，減輕疲勞等所唱的歌）。

「一根棒棒，上山下鄉，兩根索索捆不落，颶風下雨，都要雄起（四川方言，意為加油）……」這首號子他唱了25年，成功在重慶安了家。

「那時候穿着幾毛錢的草鞋，連解放鞋（布面膠鞋）都不捨得穿，棒棒是自己用竹竿砍的。不過那時候，『棒棒』能賺到錢。我離開這個職業的時候，已經很難了。身體吃不消，也沒生意，索性不做了。」

2015年，鄧禮俊成了一名貨車司機，「以前扛一百多斤的貨，走幾百米挺累，現在就是一脚油門的事兒。」但他也有遺憾，「還是做『棒棒』自由，我們遇到堵車也惱火。」

「時代變了，我從前那些老朋友，有擺攤賣夜宵的，有做廢品回收的，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再沒人做了，朝天門現在的『棒棒』們，可能是最後一代之了。」